

台北秧歌

蓝博洲◎著

在过的那些生命曾经用冷静的烟幕里的客在史遗漏的当权片构索为的命运从堆料杂冗繁的资料代白色恐怖历史中蓝博洲花禁而笼罩在的台湾历史

台海出版社

蓝博洲文集

台北秧歌

——追忆一九四九年台北四·六学运

蓝博洲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北秧歌——追忆一九四九年台北四·六学运/蓝博洲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5. 7
(蓝博洲文集)
ISBN 7-80141-410-1

I. 台... II. 蓝...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5491 号

书 名/台北秧歌——追忆一九四九年台北四·六学运
丛 书 名/蓝博洲文集
著 者/蓝博洲
责任编辑/谢 香
装帧设计/水木子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69
字 数/1670 千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1-410-1 定价: 240.00 元 (全六册)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蓝博洲先生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写作已近20余年。其间在台湾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藤缠树》，报告文学《台湾好女人》、《天未亮》、《麦浪歌咏队》、《幌马车之歌》、《沉尸流亡二·二八》、《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1913~1945年》、《白色恐怖》、《红色客家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等十余部作品。

我社这次出版的6卷本《蓝博洲文集》是据台湾版本编定的。各卷卷名如下：一、藤缠树；二、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台湾作家；三、台湾好女人；四、台北秧歌；五、幌马车之歌；六、红色客家人。

关于《蓝博洲文集》的出版，有几点需作如下说明：

其一：文集中各卷在台湾出版时，单独成册，自成体系，此次编入文集时对部分书稿内容进行整合，重取书名：如《台北秧歌》系由台湾版的《天未亮》《麦浪歌咏队》两书综合重编而成；《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台湾作家》是由台湾版的《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易名，本次还另编入了《杨逵与台湾地下党关系的初探》、《遥念范泉先生》两篇文章。《幌马车之歌》书稿采用的是2004年10月台湾增订版。

其二：陈映真先生为台湾版《红色客家人》一书写的序文《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系统地阐述了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国际及台湾的政治情形和蓝博洲先生的创作情况，这次把它放在文集最前面代总序言。赵遐秋先生为

此文集作的序，作为总序之二。凡台湾版书中既有的序或后记，作为该书的一部分，均予以保留。

其三：在编辑过程中，对书稿内容进行了一些处理：

①对涉及到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由于两岸的评价标准不一，为避免图书出版后可能引起争议，如对谢雪红、张光直等人的评价问题，编辑过程中作了一些删改。

②书中凡涉及到把台湾共产党称为“匪徒”、“匪党”、“匪谍”之处，根据上下文内容，或删或改，确因历史原因必须保留的，如“匪谍案”均加上引号。

③对国民党当局的机构名称均加上引号，如“安全局”、“军法处”、“保密局”等。

台海出版社

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

（代总序）

陈映真

孙中山所奠定的国共合作体制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扶助中国工农阶级，振兴中华的政策，在1927年由国民党联合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军事恐怖政变中破裂，屠杀、酷刑和囚禁了大量爱国知识分子、学生和共产党人，并从此展开了长期的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随着世界抵抗法西斯轴心的战争之发展，迅速伸向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转烈，美国在军事、警察、反共情报作战等方面和国民党进行密切的合作，协助国民党对中国的政治异议者进行残酷的逮捕、拷问、监禁和屠杀。四川红岩监狱，就是由美国与国民党在特务、警察工作上的巨大合作组织——恶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逮捕、拷问、囚禁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爱国分子的大本营。

1947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内战形势急转直下。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对峙不断增强，美国开始全面在它势力范围——所谓“自由世界”——创造和支持“次法西斯蒂”（subfascist）右翼、反共、独裁政权做美国的扈从国家（U. S. clientstates）。原来在二次大战过程中，在亚洲和拉美、非洲等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帝国主义、力争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势力，在反轴心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第三世界一股坚强的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潮流。二次大战结束，轴心国资本主义各国固无论矣！即同盟国资本主义/前殖民主义国家如英法，也在大战的损耗中精疲力竭。因此，二次大战甫告结束，亚非拉大地上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潮不断高涨。这股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特别在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立之后，使得战后力图恢复二次战前旧殖民体制和利益的一切镇压和努力失去效力。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开始发展一个新的战略，即新殖民主义的战略：由前殖民主义国家允许和同意其各殖民地取得形式上的“独立”，却以继续保持旧殖民母国对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各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力作为交换条件。

当然，这些新“独立”的、做为旧殖民地母国之代理统治的扈从政权，是不得民心的。为了确实地保护美国在各前殖民地的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美国遂采取

创造和支持各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事独裁政权，对其国民施行残酷破坏人权的独裁而腐败的统治。这“次法西斯蒂”“美国扈从政权”，以下述的各种犯罪手段，广泛而严重地加害于各族人民：

挑动内战：以武器和金钱支持旧殖民地非民族 denationalized 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抗当地一切工农改革势力，激起长期艰困的民族内战，分化民族团结，颠覆民族民主革命，企图使当地政权长期扈从化，维持其帝国主义的各种利益。

干涉内政：阻止当地政府经济独立自主政策，以颠覆、政治暗杀手段瓦解当地政府将外国企业在合理条件下收归国有，压抑外来资本、培植本地资本的政策。干涉当地汇率、物价；干涉对外采购自由，干涉选举；干涉一国的对外政策；在一国内部支持亲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势力等等。

严重破坏人权：美国策动和支持亲美军事政变。政变后，支持对一切反美、民族自主势力进行广泛彻底的非法逮捕、拷问、监禁和屠杀。为了扈从国家的“稳定”以巩固美国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历来广泛支持各扈从国的恐怖政治，支持反共军事独裁政府的一切肃清异己的残酷屠杀和拷问。

1989年12月27日，《波士顿地球报》(BostonGlobe)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拉美许多亲美军事独裁政权：

在没有任何罪名下，政治异己分子在枪尖下被成批带走。军人把无数的平民从他们的家中拉走，却把糖果塞到被捕者小孩的手中。脆弱的文人政府必须向军方请教政府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果这像是诺瑞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专制统治下的巴拿马，事实并不然。在中南美洲，上述的军人全穿着美军式的制服。这些军人支配着这些向大国交付了主权的国家。

1947年，美国在希腊、土耳其屠杀“共产党人”多达1000余人。1948年，美国协同李承晚屠杀80000名韩国济州岛起义农民。1954年，在瓜地马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反美的阿尔本兹（Arbenz）政权，建立亲美军事独裁政权，并对瓜地马拉土著印地安人进行灭族性屠杀。1955年，美国支持的军人推翻阿根廷裴隆政府，屠杀、监禁无数。1960到1963年，美国抵制加纳的杰干反美政权，唆使当地亲美右翼反对和抵抗政府。1946年，美国用枪打死21个企图在运河区竖立巴拿马国旗的巴拿马爱国学生。1964年，美国推翻巴西文人政府，并支持成立一个统治巴西20年的军事独裁政权。1965年，美军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国，杀害了2800名以上的多明尼加军民。1965年，美军出兵救平反美蜂起。1967年，美国领导的军队在玻利维亚镇压共军，逮捕并杀害拉美革命英雄盖瓦拉（CheGuevara）。1965到1973年，美国调训乌拉圭特务和警察，协助政府对异己分子进行广泛的非法逮捕与拷问，促成1973年乌拉圭军事亲美独裁政权的成

立。1973年，美国支持的智利军方推翻了民选的阿颜德（Allende）左翼政府，造成30000智利人死亡，使皮诺契特军事独裁政府在智利维持了16年统治。1974年，美国干涉雅买加曼莱（Manley）的反美民族主义政权。1983年，美国出兵侵略格瑞纳达。1986年，美国出兵玻利维亚“消灭古柯硷制造工厂”。1989年，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逮捕巴拿马总统诺瑞加回美侦讯。1980年，美国批准韩国军队镇压韩国光州学生运动，残酷虐杀学生和市民数百名。1980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造成29000死亡。

必须从这整个战后美国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罄竹难书的犯罪背景中，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美国支持国民党在1950年韩战爆发以后以迄1954年，在台湾进行持续性、广泛而残酷的政治扑杀运动的深刻意义。韩战爆发以后，中国大陆成了美国头号假想敌。为了取得大陆的各项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台大肆活动，一方面支持国民党在台进行对真假“匪谍”的广泛逮捕、拷问、监禁和虐杀，一方面迫使当时极端孤立的国民党与CIA合作，进行大量反中国和反中共的行动。作者蓝博洲在这本书中所报告的50年到54年国民党的“异端扑杀”运动，便是当时美国改变方针，决定选择国民党为其反共战略上的扈从国家，从而在台建立一个蒋氏高度独裁的“次法西斯蒂·反共国家安全国家”（anti subfascist communis tnational security state）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在这个巨大的恐怖政治中，

国民党在台湾杀害了 4000 至 5000 个本省和外省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也将同样数目的人投入 10 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一直到 1985 年，最后一个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终身监禁犯才被释放出狱。

蓝博洲，一个台湾客籍工人的儿子，在 1986 年的尚未“解严”的时代，开始了探索、发现和揭露台湾战后史上这一段长期被暴力湮灭的历史的工作。其中头两部作品，《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都曾分别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发表在今已休刊的《人间杂志》上，而震动了读者。《人间杂志》的休刊，并没有使蓝博洲停下他的笔。他继续揭发这沉埋在谎言与阴谋的荒芜中长达 40 年的、悲壮而又凄惨的万人之冢，把 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霸权主义和内部对外扈从、对内进行凶残的次法西斯蒂铁腕统治的暴力和恐怖下，对生与死，对意义和虚无做了最艰难而勇敢的选择，在激烈的壮怀中，为民族和阶级的自由与解放，打碎了自己，向不知以恐怖与暴力为耻的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做出了震撼山谷的怒吼和抗议的一代最耀眼的形象，重新构建和显现出来。这是 1950 年大恐怖以来台湾史学界、言论界、文艺界和文化界近于绝无仅有的重大贡献。

1950 年以来，台湾的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长期受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洗脑，对于台湾战后充满了歪曲、谎言、恐怖和暴力的历史毫无批判的研究和创作能力，从而在 40 年间，为美国涂脂抹粉，把美帝国主

义装扮成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推进者、守护者。今天，当美国叫嚣以中共“改善其人权条件”交换使中共取得“最惠国待遇”，以便大陆得以向美输出廉价劳力密集的轻工产品时，人们早已遗忘，甚至不知道，在国民党自1950年迄1965年间在台湾进行反共反民主逮捕、拷问和虐杀、监禁时，美国持续以16亿美元的经援、40余亿美元的军援给予台湾，并且截至20世纪80年代才停止台湾的“最惠国待遇”的事实。美国对韩国军事独裁政府付出了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上个世纪60年代屠杀百万“共产党人”的印尼，美国支付了20余亿美元的军援。美国对中南美洲军事独裁政府乌拉圭、委内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欧洲亲美反共独裁政权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从来也没有因为它们残暴至极的人权蹂躏而停止过“援助”和什么“最惠国待遇”。

蓝博洲的这本集记录和文学于一体的《幌马车之歌》，是台湾年轻一代作家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次法西斯扈从”者的谎言一记强有力的反驳！1988年，世界冷战以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对美投降和东欧的解体结束了。国共内战的形势也在不以美国扈从者主观意愿为转移地趋向于终结。在这“冷战—内战”双重体制的衰亡历史中，如果没有台湾内部有意识地在历史学、社会科学、文艺和文化上对荒废、黑暗、充满歪扭、暴力、谎言与恐怖的台湾战后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清算，则冷战与内战的幽灵、美国扈从主义和次法西斯蒂的亡灵，就不会自动

消失。在这意义上，蓝博洲这本《幌马车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战和内战历史的恶魂厉鬼的桃花木剑，值得喝彩。

序

赵遐秋

我和蓝博洲相识在台北。

那是在1997年。那一天，我作为中国文联代表团的一员访问台湾，和台北的朋友们在敦化南路一家日本料理店聚会，其中就有博洲。在场的陈映真拉着博洲向我介绍：“他就是《幌马车之歌》的作者蓝博洲，刚从苗栗赶来。”当时，我的脑海里，立刻呈现出博洲作品里记述的钟浩东校长临刑赴义时唱着“幌马车之歌”的情景：

我看见铁门外两个面孔犹嫌稚嫩的宪兵，端枪、立正，冷然地站立铁门两侧。整个押房和门外的通道，立时落入一种死寂的沉静之中。我看着校长安静地向同房难友一一握手，然后在宪兵的扣押下，一边唱着他最喜欢的一首世界名曲——《幌马车之歌》，一边从容地走出押房。于是，伴随着校长行走时的脚链拖地声，押房里也响起了由轻声而逐渐宏亮的大合唱：“黄昏时候，在树叶散落的马路上，

目送你的马车，在马路上幌来幌去地消失在遥远的彼方。”“在充满回忆的小山上，遥望他国的天空，忆起在梦中消逝的一年，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浩东……曾经告诉我说：“每次唱起这首歌，就会忍不住想起南部家乡美丽的田园景色！”

顿时，我对面前这位留着短胡子的青年作家，油然而生起了敬意。随着和博洲交往的增多，又读了他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天未亮》、《麦浪歌咏队》、《藤缠树》、《台湾好女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等作品，我深深地被博洲的精神所感动了。正如博洲所说，在创作台湾现代革命人物的报告文学实践中，他“找到一个支柱，一个源头，知道在台湾历史中，曾经有过理想主义的这些人，在文学上，所要表现的就是这些台湾史上最精彩时代的‘典型’”。^①无疑，这样的创作历程，也是博洲的人生观念和心态养成的过程。就是说，他的人生观就在革命先行者精神的感召下，坚定地树立了起来。他说，他的人生观，“已经很笃定”，对当前整个社会，“虽然很看不过去，但是我有信仰。”^②就是带着这样的崇高的信仰，博洲不停顿地写作。一部又一部地，他向民众奉献出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坚定不移地前行着。

①② 林靖杰《那天，我看到了一支绿岛大学的队伍》。《新新闻周刊》1992年3月1日-7日。

报告文学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博洲的报告文学把它的新闻性和文学性融合得相当和谐，相当完美，在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方面，已经收获了相当好的社会效应。特别是他的报告文学实践，在某些方面还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关于新闻性含义的界定。这，又给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增添了新的积累，意义特别。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包括三个因素：时代性（或者叫作现实性）、真实性和时效性。其中，真实性是最基本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而时代性就是要求报告文学面对现实，表现时代精神。至于时效性，情况比较复杂。

一般说来，读者总想尽快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最新变化和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要求报告文学讲求时效。比如，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发生之后，收录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里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如《江湾血战》、《八字桥》、《在吴淞炮火线下》等，就及时地报告了人们迫切关注的而又为人所不知、世所不晓的战况，既快，又新。有时候，事变发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报告文学的作者才将事变报告出来，这算不算失去了时效呢？也不。比如，1941年12月8日，香港战事爆发。26日，港、九全部沦陷。香港国新社记者唐海写了《十八天的战争——香港沦陷记》，于1942年初在桂林出版。又比如，1946年9月22日晚间11点，上海靠近黄浦滩的朱葆三路上，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命案——侵华美军海伦兵舰上的伍长饶德立克打死了中国黄包车夫臧大咬

子。《文汇报》记者唐海于1947年1月写成、8月10日改定《臧大咬子传》，予以发表。从时间上看，这都不算十分及时，说不上非常迅速，但是，这两部作品所写，也是人所不知，世所不晓的。在这里，新，弥补了快的不足。我们还得承认这些作品的时效性。至于夏衍的《包身工》写包身工制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写红军长征，也谈不上迅速、及时，而且时间相隔也较长。当时报告文学界就曾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们的报告，十分新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新闻的价值。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报告文学的“另类”，不是典型的报告文学样式。现在看来，对时效性含义的界定，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快”与“新”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其中包括博洲关于现代革命人物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都说明，“快”是为了出“新”，“快”不是目的，“新”才是报告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支柱。即使时间相当长久的人和事，在当今世界具有时代的现实“新”意，也应该承认它具有新闻价值，它是报告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看，博洲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取得中国各项情报，就在台湾大肆活动。他们支持国民党政府大肆逮捕、拷问、监禁和虐杀所谓的“匪谍”，进而迫使当时陷入极端孤立的国民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推行反华反共的措施。博洲创作的关于台湾现代革命人物的报告文学，就真实地再现了1950年到1954年国民党政府的“异端扑杀”